

文學研究叢編
第一輯

木鐸出版社

文學研究叢編 第一輯

木鐸出版社

文學研究叢編 第一輯

發行人：顧 俊

出版者：木 鐸 出 版 社

局版台業字一三四九號

地 址：台北市汀州路七三四巷九號

電 話：三九三一九九〇・三二一三六四一

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印行

定 價：一三〇元

出版說明

文學之涵義至廣，其在吾國古代，尤爲一切述作之總稱。凡四部專著，其能會通衆心，兼發情智者，無一不可以文學視之。「五四」以還，研究中國文學之專家學人輩出，其所整理成績，除專著而外，發表於學報、期刊者，雖能傳誦一時，然歲月遷移，蒐求匪易。本社向以刊行文史哲論著、傳播學術資料爲職志，嘗先後輯印「國學論文薈編」、「文史集林」諸輯貢獻學界，「文學研究叢編」則爲專門收集早年文學論著資料而爲坊間不易覓求者爲主，不定期分輯出刊，廉價供應各界參考。

木鐸編輯室

木鐸出版社

文學研究叢編 第一輯

目 錄

采詩和賦詩·····	夏承燾(一)
詩「履帝武敏歆」解·····	于省吾(一三)
招魂試解·····	陳子展(二三)
論中國文學中的音節問題·····	郭紹虞(四一)
中國詩與中國畫·····	錢鍾書(七三)
漢大曲管窺·····	丘瓊蓀(九一)
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·····	樹人(一二三)
花蕊夫人宮詞考證(附宮詞校定本)·····	浦江清(一二九)
論脂硯齋重評石頭記(七十八回本)·····	
的構成年代和評語·····	吳世昌(一八一)
論再生緣(上)(下)·····	陳寅恪(二五一)

『采詩』和『賦詩』

夏承燾

月輪樓曉燈錄之一

一 『采詩』

詩三百篇，春秋時采自各國；漢人論『采詩』之制，有班固、何休不同的兩說：

班固《漢書·食貨志》說：『男女有不得其所者，因相與歌詠，各言其傷，……春秋之月，羣居者將散，行人振木鐸于路以采詩；獻之太師，比其音律，以聞于天子。』同書《藝文志》說：『古有采詩之官，王者所以觀風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也。』這說是王官下至各國采詩的。

何休注《公羊傳》宣公十五年：『男女有所怨恨，相從而歌，飢者歌其食，勞者歌其事。男子六十，女子五十無子者，官衣食之，使之民間求詩。鄉移于邑，邑移于國，國以聞于天子。』這是說采詩並無專責的王官，是由各國自采以獻于天子的。

何休之說，有一旁證：《國語·魯語》閔馬父說：『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，以《那》爲首。』王國維《觀堂集林》卷一《說周頌》：『考漢以前，初無校書之說，余疑魯語「校」字當讀爲「效」，

「效」者獻也，謂正考父獻此十二篇于周太師。『《商頌》非商代作品，乃周中葉宋人所作，故《商頌》實即宋頌。』（王國維有考。）依王氏之說，正考父嘗獻其本國之頌于周太師。使此說而確，則可證成何休各國獻詩之說。

班固之說有不可信者三點：

（一）先秦之書，並沒有說春秋時有采詩之官。『道人以木鐸徇于路』見《左傳》襄公十四年師曠引《夏書》；這個行動，或爲警戒人民、或爲宣布政令，不必是爲采詩。（道人爲宣令之官，見古文《尚書·堯征》篇孔安國註。）

（二）周代天子與諸侯的關係，不盡同于後世朝廷之于郡縣，刑政教令未必能直達；況當春秋分崩離析之時，以王官徧行各國采詩，亦勢所難能。

（三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凡王官至魯，如隱公七年『凡伯來聘』，桓公八年『家父來聘』等等，皆明書于《春秋》，而從無王官來魯采詩的記載。

何休各國獻詩之說，是否可以確信呢？我對這也有疑問：

列國若各獻詩于周天子，何以十五國風中沒有楚風？爲什麼宋、魯只有頌而沒有風？

關於這點，前人贊成何休各國獻詩之說者，是這樣代他解釋的：

（一）楚人熟習三百篇，雖明見于《左傳》（如楚子賦《吉日》以享鄭伯，楚武王引《周頌》以論築京觀等），但楚自稱王，曾經觀兵雒郊，問鼎輕重；他們本來是蔑視周室、不奉王朝禮制的，所以不會

獻詩。

(一)宋是王者之後，魯是周公的兒子伯禽所封，兩國都可用天子禮樂，異于他國；所以荀偃說『諸侯宋、魯，于是觀禮』（《左傳·襄公十年》）。頌是天子之樂，諸侯中惟宋、魯配用，所以二國只獻頌而不獻風，以自表異。若王臣采詩，不應遺此二國；因為是各國自獻，所以二國不獻風。

這樣解釋何休之說，好像也可以說得通，其實還是有疑問的，舉三點如下：

(一)十五國風中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、《唐》、《豳》都不是國名；(二)春秋時還沒有魏國；(三)以《王風》與各國之風並列，不合情理。《論語》只稱『詩三百』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、《雅》、《頌》，從無《國風》之名。《國風》一辭始見于《荀子·大略》篇（《大略》篇云：『《國風》之好色也。傳曰：『盈其欲而不愆其止。』』楊倞注：『好色』謂《關雎》樂得淑女。』）和《禮記·表記》（《表記》引『《國風》曰：『我今不閱，皇恤我後。』終身之仁也。』）二文都可能是漢人作。前人因無法說通這個問題，便存而不論。今人考定『國風』的『國』，義同方域，猶之稱『邦』稱『方』（張角稱『三十六方』）。十五國風其實只是十五個地方的土調，猶之今言粵謳、吳歌、弋陽腔、紹興調；『王風』猶今言京調、京腔（《大雅·崧高》『其詩孔碩，其風肆好』，『詩』指辭，『風』指調）。據此，『國風』之『國』既有問題，則各國獻詩的說法，自然也很可懷疑了。

或者也許要問：《左傳·襄公二十九年》，記吳公子札聘魯，請觀于周樂，爲之歌齊，曰：『國未可量也』，爲之歌陳，曰：『國無主，其能久乎？』爲之歌鄭，曰：『民弗堪也，是其先亡乎！』豈非分明以『國

風』爲春秋國名？其實《左傳》此文也有問題：季札觀樂于魯，『有舞韶箚者』。韶樂因周太師摯而入齊，惟齊有之，所以孔子在齊聞韶，三月不知肉味；若魯國也有韶樂，孔子不至于沒有聽過。韓愈說『左氏浮誇』，這就是一例。

以上是說班固、何休兩家『采詩』之說都難成立。

那末，《詩經》究竟是怎樣輯成的？這問題在現在還無法作確定的答案；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：現在的《詩經》的國風部分已經不是當時民間的原始的東西，是後人加工整理過的。我們看：風詩以地域論：西起秦，東至齊，北起唐（山西），南至二南（江漢流域），東西南北各千多里。以時間論：《二南》舊說作于周初，《株林》舊說是詠陳靈公事，靈公被弑于魯宣公十年（在孔子生前四十七年），時間先後相去五六百年。何以形式音韻幾乎劃一。並且《鄭風》、《唐風》都有『豈無他人』之句，王風、鄭風都有『如三月兮』之句，《召南》、《豳風》都有『之子于歸』之句，我們認爲它是經過一番整理的加工的讀本，大概是可以說得通的。

這整理加工的人，可能是王朝統治者，也可能就是孔子。

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的孔子刪詩之說，孔穎達、鄭樵、朱熹、葉適、朱彝尊、江永、趙翼、崔述、魏源諸人都不相信；以爲《論語》一則曰『詩三百』，再則曰『誦詩三百』，當指古人已定之本，不應是指他自己的刪定本。或又據《論語》『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雅頌各得其所』，說孔子對三百篇只有正樂之功。其實孔門詩教，除了『興、觀、羣、怨』的文學內容之外，還有：（一）詩聲之教，《史記·孔子世

家所謂『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』。這是音樂方面的；（二）詩義之教，《論語》所謂『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』，『誦詩三百，授之以政……使于四方……』這是倫理、政治方面的；（三）詩言之教，《論語》所謂『不學《詩》，無以言』，『子所雅言，《詩》、《書》、執《禮》皆雅言也』，『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』。這是文字語言方面的。孔子是整理古代文化的重要人物，他對三百篇很可能于正樂之外，曾經做過多方面的整理工作。所謂『《雅》、《頌》各得其所』，或不僅僅是正樂一方面的工作。

《論語》、《墨子》皆稱『詩三百』；三百之數，也許是當時流行之本，不輯自孔子；孔子原不曾刪詩；但是不能因此懷疑孔子對三百篇做過其他各方面的整理工作。

總之：

一、漢人所謂『采詩』，班固說王官到各國去采，何休說列國自己獻，兩說都有可疑，恐非事實。

二、孔子刪詩之說，原不可信；然三百篇來自各方，必有人爲它作過一番整理工作，孔子于正樂之外，可能有其他各方面整理之功。其目的是利用此大半來自民間，家絃戶誦的文學作品，來貫注儒家思想內容，作爲普及教育、鞏固古代禮教之用。

這是我對三百篇是怎樣輯成的一種猜測。

二 『賦《詩》』

春秋時代，《詩》三百篇在政治上的作用，詳見于《左傳》。《左傳》引《詩》共一百三十四處，其中關

于卿大夫賦《詩》的共三十一處。他們有的拿《詩》來作爲辦國際交涉的辭令，有的拿它作爲官吏士大夫間互相贊美或互相諷刺和規勸的工具，也有拿它批評統治階層的昏庸醜惡，爲百姓作呼籲、控訴的武器。他們只求對政治上生活上有其實際的效果，往往不大理睬作品的原意是怎樣的。

賦《詩》既成爲當時外交官員所必須具備的一種政治才能，所以在國際交際場所中，不懂得《詩》，便會丟臉：

齊國的慶封往魯國行聘，魯國叔孫和他共食，慶封沒有禮貌，叔孫賦《相鼠》：『人而無禮，胡不遄死』。慶封不懂。（襄公二十七年）

第二年，慶封從齊奔魯，叔孫穆子和他共食，又無禮，穆子使樂工爲他誦《茅鴟》（逸詩，刺不敬），他也不懂。（襄公二十八年）

賦錯了《詩》，也會受人奚落：

鄭伯宴晉趙孟於垂簾，趙孟要鄭大夫們賦《詩》。鄭國的伯有賦《鶉之奔奔》。趙孟說：『牀第之言不踰闕，況在野乎，非使人之所得知也！』散會的時候，趙孟告晉國的叔向說：『伯有將爲戮矣！』叔向說：『所謂不及五稔者，夫子之謂矣！』（襄公二十七年）

寧武子聘魯，魯侯爲他賦《淇水》及《彤弓》，武子以爲他賦錯了，不答賦（因爲這兩詩只有天子才配用，諸侯是不應該賦的）。（文公四年）

尤其是小國周旋于大國之間，《詩》的用途更加多。他們用它來趨奉權貴：

鄭伯宴晉趙孟，穆叔賦《鵲巢》（『鵲巢鳩居』比喻晉有國而趙孟治之）。趙孟曰：『武不堪也。』又賦《采芣》，曰：『小國爲褊，大國省穡而用之，其何實非命？』（昭公元年）

用它來請救兵：

齊國屢次壓迫魯國，魯使穆叔求救于晉，晉人不聽。穆叔說：『敝邑之急，朝不及夕！』往見晉國的中行獻子，賦《祈父》，見范宣子，賦《鴻雁》的末章。（襄公十六年）

用它來訴苦：

魯侯從晉國求盟歸，同鄭伯會于棗地，鄭伯請和于晉，魯侯爲他全成。鄭伯宴魯侯，鄭子家賦《鴻雁》（自喻寡弱，求大國相助）。魯季文子說：『寡君未免于此。』文子賦《四月》（喻自己行役之苦），子家賦《載馳》的第四章（更告急也），文子賦《采芣》的第四章（言不敢安居）。（文公十三年）

用它來排難解紛：

晉人執衛侯，齊侯、鄭伯爲救衛侯往晉，齊國子相齊侯，賦《蓼蕭》；鄭子展相鄭伯，賦《緇衣》。國子使晏嬰向晉叔向私下求情，國子賦《鸛之柔矣》（逸詩），子展賦《將仲子》（說人言可畏，大家將不滿晉國）。晉侯乃放衛侯歸。（襄公二十六年）

他們靠賦詩以折衝于俎豆之間，應對得好，有時也可以紓國難于一時，也可以稍殺大國強敵的氣燄。晉侯使韓穿使魯，要魯國拿出新取于齊國的汶陽之田，重歸于齊。魯季文子在送韓穿的時候說：『汶陽之田，敝邑之舊也，而用師于齊，使歸于敝邑。今有二命，曰：『歸諸齊！』詩曰：『女也不爽，士二三其行；士也罔極，二三其德。』』

「三其德。」七年之中，一予一奪，二三孰甚焉。士之二三，猶喪其偶，而況霸主；霸主將德是以，而二三之，其何以長有諸侯乎！詩曰：「猶之未遠，是用大簡。」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，是以敢私之。」（成公八年）

晉敗齊師于鞍地，必要以齊君的母親蕭同叔子爲質，又要齊之封內，盡東其畝。齊國的賓媚人爲使，引詩「孝子不匱，永錫爾類」，「我疆我理，南東其畝」，「布政優優，百祿是遒」，以折晉人。（成公二年）

雖然他們辦成這些交涉，未必完全依靠賦《詩》，但賦《詩》對辦交涉有一定的幫助，也是事實。孔子說：「不學《詩》，無以言。」誦《詩》三百，使于四方，不能專對，雖多，亦奚以爲！」就是爲這些情況而說的。

他們在國際莊嚴的壇坫上所誦的詩，民歌多于雅、頌，並且男女的戀歌多于一般民歌。這在我們現在看來是不免要驚異的。春秋時有兩次賦《詩》較大的場面，也就是賦戀歌最多的場面；第一次是《左傳》所記昭公十六年晉鄭之會：

鄭國的六卿爲晉宣子餞行。宣子說：「二三子請皆賦，起亦以知鄭志！」鄭子齋賦《野有蔓草》。宣子說：「孺子善哉，起有望矣！」子大叔賦《褰裳》。宣子說：「起在此，敢勤子至於他人乎？」子游賦《風雨》。子旗賦《有女同車》。子柳賦《摯兮》。宣子說：「鄭其庶乎！」二三子以君命脫起，賦不出鄭志，皆曜燕好也。」

另一次是在這次以前的二十一年（襄公二十七年），鄭伯享趙孟于垂隴，趙孟也請鄭七子賦詩，子展賦《草蟲》，趙孟曰：「善哉，民之主也！抑武不足以當之。」子大叔賦《野有蔓草》，趙孟曰：「吾子之惠也！」在這兩次會場上，賦詩的人和所賦的詩都特別多，而所賦《野有蔓草》的「邂逅相遇，適我願

兮，《褻裳》的『子不我思，豈無他人』，《風雨》的『既見君子，云何不喜』，《有女同事》的『彼美孟美，洵美且都』，《揮兮》的『叔兮伯兮，倡予要汝』，都是鄭風裏的戀歌，是被後人指爲『淫詩』的；當時鄭國對晉國是以弱小對強大，趙孟又是晉國炙手可熱的權貴，而鄭國的卿大夫却在這種場面上唱起鄉土的戀愛小調來！但當時賦的人不以爲諱，聽的人也不以爲嫌，趙孟還不斷地贊成：『善哉善哉！』並且說：『賦不出鄭志，皆暱燕好也！』這在後人看來，豈非怪事！（前文所舉垂隴之會，趙孟不滿鄭國伯有賦《鶉之奔奔》，說『床第之言不踰閭』，好象他是反對賦『淫詩』的；其實這是趙孟不滿伯有在他自己國君鄭伯面前肆無忌憚地賦『人之無良，我以爲君』兩句，而不是怪他賦『淫詩』；若作爲他反對鄭大夫賦『淫詩』來看，那就無法解釋他爲什麼又贊美子大叔、子游諸人賦《褻裳》、《風雨》了。）

還有一個突出的例子：《召南》的《野有死麕》是民間很熱烈的戀歌，（前人爲這首詩作『小序』的也說是『天下大亂……遂成淫風』。）末句『無使厯也吠』！是穢褻的情話；而《左傳》記昭公元年鄭伯享趙孟的故事說：

鄭伯請趙孟、叔孫豹、曹大夫會宴，鄭國的子皮賦《野有死麕》的末章（就是『無使厯也吠』的一章），趙孟賦《常棣》，并且說：『吾兄弟比，以安厯也，可使無吠。』鄭國的穆叔、子皮和曹大夫都起來拜，並且舉酒說：『小國賴子，知免于戾矣！』

他們用厯不吠比喻敵人懾服（趙孟三句話的意思是說：我們兄弟國家團結起來，可以鎮服敵人，使他們不敢放肆）。這個解釋和這首情歌的原意是距離很遠的；但他們居然以這樣附會的說法把這場交

涉辦好了！

那時的卿大夫爲什麼在國際莊嚴場面上賦民間戀歌？依我的推測：這些民歌在當時是家喻戶曉的，它的普及性遠超過于《雅》、《頌》和聖經賢傳（《左傳》裏引《雅》、《頌》和《易》、《書》的不及引這些戀歌之多）這是其一；戀愛是人類的共同情感，拿它來暗示要表達的意思，大家容易體會，並且比直說宛轉、深刻些；這是其二。後來儒家和諸子時常拿它作爲說教的工具（如《論語》引『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』），也許就是利用它這兩點功能。

了解這個原因，也就可以解釋前人對《詩經》的兩點疑問：

（一）後代學者文人把《國風》中的民間戀歌叫作『淫詩』，他們懷疑這些『淫詩』何以會在三百篇裏和《雅》、《頌》並列，懷疑孔子刪《詩》何以不刪掉它；因之在元代鬧出王柏刪《詩》的笑話（他刪了三十二首詩，都是熱烈的戀歌）。我們看前文所舉：鄭大夫子大叔敢于拿《鄭風·褰裳》的『子不我思，豈無他人』對着晉國權貴趙宣子誦，居然使趙宣子降意受聽，不以爲瀆褻；可以知道，在很久以來，這些民間戀歌已不被作爲『淫詩』看待了；它因爲政治上實際的功用，已換上了政治外衣，和《雅》、《頌》有其同等的身份了。把這些作品看作『淫詩』，那是在這些作品失了政治上實際功用以後的事（有人說孔子《論語》裏不諱說『好色』，所以會看重這些情歌；這還是不完全合于事實的推測）。

（二）後代文人很不滿漢儒注《詩》，怪他們硬把民間情歌附會到政治上去；如《毛傳》說《褰

裳』的『子不我思，豈無他人』爲『思見正也；狂童恣行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』，說《山有扶蘇》和《狡童》都是『刺忽』之辭等等。這些原都是極可笑的附會。但是我們看了《左傳》所記春秋誦《詩》的故事，知道這些附會並不始於漢儒；『斷章取義』原是春秋卿大夫賦詩的老辦法。如前面所舉的鄭伯享趙孟解《野有死麕》的故事，就是歪曲詩意比漢儒注《詩》更厲害的一個例子。我們因此知道，漢儒注《詩》的種種牽強附會的說法，原來是有其相當久遠的淵源和傳統的。漢代經師和春秋卿大夫們對《三百篇》有一個相同的要求，就是不惜改變原詩的本意來達到當時政治目標；儘管他們政治的對象和作用不盡相同，他們的目的却是一致的。

也許有人懷疑《左傳》這些故事的真實性；像吳季子札觀樂那些故事，拿年代和事實來考核，原是有問題的；但《左傳》無疑是秦漢以前的一部古書，記下這些故事的原是秦漢以前人，那麼，依據這些記載，我們說在秦漢以前，三百篇的原意已經被許多人作了許多次的改裝，這總是不能否認的事實了。

後 記

先秦古書像《論語》、《荀子》，引《詩》已有『斷章取義』的例子（《禮記》的《表記》、《坊記》、《緇衣》裏也有），孟子說《詩》，主張『不以文害辭，不以辭害意，以意逆志』。『文』指字義，『辭』指章句之義，『意』指讀者的意思，『志』是詩的本意。到了漢代董仲舒，進一步說『《詩》無達詁』，是說

